

■ 图片故事

我家现存最古老的东西是二八自行车，与我同龄。

时光回到我出生那天，母亲正在给炭炉添柴，忽然肚子一阵疼痛，没多久，我就呱呱降生。我虽出生，但脐带还没有剪。父亲连奔带跑到医院，请回医生，剪断脐带。打完结，敷上药，看着虚脱的父亲，母亲决定给他买辆车。

自行车是我家的功臣，它和父亲一起吃苦，与父亲一样没有怨言。我家在永安洲，母亲娘家在宜堡镇。每次母亲回娘家，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拎着礼物，徒步一两个小时，苦不堪言。

有了自行车，就省事很多。父亲把我先抱上大梁，然后上车骑上一段路，母亲再跳上后座。母亲刚上车，车还不稳，会摇晃。父亲得全力以赴，双手稳住车头。省了我们的的心，却加重了父亲和车子的负担。

母亲坐在后座看到父亲满头大汗，心疼地拿出手帕，时不时给他擦擦汗，时不时让他歇一会儿，父亲只有一句话：“不用！再坚持一会儿就到了！”一路桥多，上坡最累，自行车链条嘎嘎响，父亲弓着腰喘粗气。

父亲不对自行车“发火”，只有一次例外。那年我刚升入高中，父亲打算骑车带我去理发。其时，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带过我。我说：我还是走路吧，反正也不远。他执意不肯，一手把住

# 父亲与车

□刘鹏文/图



车头，一手抹抹车后座。抹过一遍还不够，又用袖子擦了擦，示意我跳上去。

看到父亲愈发佝偻的后背，越发斑白的鬓角，我犹豫了。他却笑道：“快上来吧！”我拗不过，就像母亲那样扶住后座往上跳，意外突然发生。我还没坐稳，父亲也没能把得住车身，我们都从车上摔了下来，尖尖的轴承刺破了我的脚背，血流了出来。

父亲吓坏了，立即把我扶上车。他顾不得自己的疼痛，一瘸一拐的推着我去赤脚医生家走去。一路走，父亲一路怪自己太大意太疏忽，怪自行车太老旧不认人。我安慰他，说没事儿。他不听，一再紧张地问我疼不疼？

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觉？我摇着头，眼角里暗暗地含着泪水，强忍住，怕他发现。

喷过双氧水，用纱布包扎好，开了防破伤风的药，我们回到了家。父亲盯着骑了近20年，早已骑惯了的自行车，默默地拍了拍它的坐垫，拎了一桶水，细心的擦拭。

如今，我买了汽车，不管去哪里都是汽车来汽车往，可父亲却坐不惯。他说，四个轮子的不方便，坐在里面闷人，依旧还是将自行车推出来。后跨上车，冲我笑笑，说：“我先走了，前面会合。”

我透过车窗，看到自行车上的父亲。他是那么瘦小，那么苍老，而自行车嘎吱嘎吱的响声又是那么尖锐刺耳，父亲和自行车都已老了，但他们依旧相守在一个屋檐下。

而与自行车同龄的我，作为父亲的亲骨肉，却没能像自行车那么长长久久地陪伴在他身边。我心里愈发地不安起来，有一种莫名的痛感。明天，我就回家，用那辆父亲挚爱的自行车载着父亲兜兜风。



## 用热血温暖生命

□肖永鸿文/图

日前，我在央视看完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，而特别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——《长征》。被80年前长征红军中一个个悲壮的故事而震撼。其实，在我身边，也有很多这样的传承长征精神的人，他们是新长征中的路标。

王义生是中建二局一公司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，他为人低调，做事不喜欢张扬。他收藏着一个献血证，这是他踏上无偿献血之路的见证。十年来，他献血总量超过万升。

“我父兄都是党员，有着只讲奉献不思索取的秉性，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当看到自己的血液帮助了很多人，感到无比高兴。”谈起自己献血的感受时，他脸上总是现出欣慰的神情。

2008年的5·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王义生意识到灾区需要血液。当天他就拨通电话预约献血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走进血液中心排队献血。早餐没来得及吃的他在体检空隙，才边匆匆吃了

点食物边耐心等待，那一次他献了400CC全血。

2014年“七一”当天，他走进献血站，用无偿献血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党日活动。在45岁生日的当天，他又走进了献血站，为自己过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生日。在王义生的心中，无偿献血是一份足以让他骄傲的“事业”，而第一个传承他的事业的人就是他的女儿。

王义生的女儿在刚满18岁时，就成功捐献出300毫升全血，这成了女儿“成人礼”，也代表着她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。

“现在工作之余，我每天坚持锻炼，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。”王义生说，“我要一直献血到老，还要呼吁大家参与进来，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来力量和希望”。看到越来越多人加入了无偿献血队伍中，他感到很欣慰。

是啊，王义生无偿献血的行动也激励着周围的人，成为越来越多助人为乐、无偿献血队伍人的路标。

■ 家庭相册

## 父亲的一封信

□颜克存文/图

小时候，家在山村，经济拮据，父亲不得不背上行囊远离家乡，跟随打工的大军涌向南方。那时，生活条件艰苦，没有手机等通讯工具，书信是我们与异地打工的父亲唯一联系的方式。

记得父亲刚出去打工的那一年，因为没有电话，自他离家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知道他是否在外找到了工作，也不知道他离家时带的那点盘缠够不够，更不知道他在外的生活好不好。太多的不知道让家人日夜为他担心，除了耐心等待邮递员送来父亲的书信，别无他法。

那段日子，整天最担心父亲的莫过于母亲，她只要不干农活稍微闲下来，就会和奶奶一起念叨父亲。她说父亲第一次出门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活干，水土不服，吃的可好。总之，能想到的各种情况，几乎都在母亲的脑海里过了无数遍。

在煎熬的等待下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还是没收到父亲的信。母亲有时都能半夜醒来，一个人坐在床头，双手合十，祈求上天能够保佑父亲在外平平安安。

大约过了两个多月，邻居去镇上办事，受邮递员委托，终于把父亲写的报平安的家信捎了回来。当邻居路过家门口时，母亲正在做晚饭，刚把菜倒进锅里，一听父亲来信了，立刻跑到院子里第一时间接了过来拆开。

但由于母亲不识字，她只能叫那时刚上三年级的我来读。就这样，奶奶和弟弟妹妹都围在了母亲和我身边，一起倾听父亲报



平安。

在信里，父亲告诉母亲和奶奶他已经找到工作，一月有八百多块钱的工资。还说了刚去的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，水土不服，遇到了点小困难，所以没能及时给家里写信。最后，还叮嘱母亲在家要照顾好我和弟弟妹妹，让我们听母亲和奶奶的话，等他过年回家时给我们买新衣服。

读完父亲的信，母亲和奶奶曾一度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，露出了满脸笑容，我和弟弟妹妹也不例外，一想到父亲在信中说的新衣服，我们就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待母亲听完信的内容再回过神来时，她炒在锅里的菜，早已散发出了阵阵糊味。

书信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，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完成了“家书抵万金”的使命，但在那些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，它却用薄薄的身躯，架起了无数亲情桥梁，稳定了无数异乡游子与家人因思念而悬着的心。



■ 青春岁月

## 一千元中的深深友情

□颜巧霞文/图

我跟正玲初三时是同桌，我们性格相投很要好。她见我这副模样，赶紧安慰我：“你别让叔叔、阿姨难受，事情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几天后，正玲又来了。她告诉我，她写了信给在上海的姐姐，让她姐姐借钱给我。那时，我十六岁，正玲十五岁。她能从姐姐那儿为我借来一千元钱吗？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，一千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正玲信誓旦旦地让我别担心，好好收拾准备去学校报名。

我满怀怀着期望，在家等正玲的姐姐寄钱给我。然而两个星期过去了，依然没等到一分钱。我耐不住性子骑车去找她，到了正玲家，她妈告诉我，正玲去上海她姐那儿了。我失望极了，在心里揣测，她这是不是避开我，生怕我要她兑现承诺呢？

正玲远走上海后，我对自已说，如果爸爸实在借不到钱，我就去南方打工挣钱，换一种活法算了。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，邮递员送来一张让我激动万分的汇款单，来自上海的汇款单上赫然写着一千元的数目，是正玲姐姐汇过来的。

过了几天，我收到正玲的来信，撕开信封，粉红色信纸又被她折叠成漂亮的纸鹤状。抹平纸鹤，六张十元的钞票从纸鹤肚里露出。她在信上说，她给姐姐写信，但姐姐一直没回信，所以她就去上海缠磨姐姐，姐姐终于答应给我寄来一千元。这六张十元的钞票是姐姐给她的零花钱，她没舍得用也随信一起寄给我。

我如期去师范学校报到了。不论时光过了多久，我总能记得那一千元里藏着正玲待我绵长又深厚的友情。

## 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